

F.R.JAMESON →

第1卷

詹姆逊 **文集** COLLECTION

新马克思主义

詹姆逊，这个在西方思想文化界独树一帜的著名知识分子，以大师的气度和细腻周到的理论风格，对这个变幻莫测的时代，作出了令西方和中国知识界皆感兴奋的诊断性寓言……

主编 王逢振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詹姆逊文集. 第1卷, 新马克思主义/王逢振主编.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ISBN 7-300-05528-1/D·1020

I. 詹…

II. 王…

III. ①詹姆逊, F. (1934~)-文集②新马克思主义-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43705 号

詹姆逊文集 第1卷

新马克思主义

主编 王逢振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239 (出版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三河新世纪印刷厂		
开 本	965×1270 毫米 1/32	版 次	2004 年 6 月第 1 版
印 张	13.125 插页 1	印 次	200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314 000	定 价	24.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前言：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和他的著作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 1934— ）是当前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和理论家。生于克里夫兰，先后就读于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曾留学法国和德国，获博士学位。完成学业后，先后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和耶鲁大学任教。1985年起任杜克大学讲座教授，文学系主任兼批评理论中心主任。2003年辞去系主任职务，但仍为杜克大学讲座教授，批评理论中心主任，并兼任该校人文学科学术委员会主任。

詹姆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修法国文学，师承著名理论家埃里希·奥尔巴赫。由于曾先后到法国和德国留学，他得以从原文阅读了大量法国的理论和德国的哲学著作，拓宽了他的视野和思路，为他以后的学术研究和理论发展奠定了基础。他已经出版了大量著作，既分析文学文本也分析文化文本，形成了他自己独特的新马克思主义立场。他还发表了大量文章，批评反对理论的观点。他兼收并蓄，博采众家之长，汲取并运用其他理论的话语，参与许多当代的争论，从小说到电影，从建筑到绘画，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从金融资本到全球政治，几乎都是他关注的范畴。

在他的第一部作品《萨特：一种风格的始源》（1961）里，詹姆逊分析了萨特的文学理论和创作。该著作原是在耶鲁大学的博士论文，由于他的导师埃里希·奥尔巴赫以及与列奥·斯皮泽

相关的文体学的影响，作品集中论述了萨特的风格、叙事结构、价值和世界观。这部著作虽然缺少他后来作品中那种典型的马克思主义范畴和政治理解，但由于20世纪50年代刻板的因循守旧语境和陈腐的商业社会传统，詹姆逊的主题萨特和他复杂难懂的文学理论写作风格（那种以长句子著称的风格已经出现），却显示出他反对当时的守旧思潮，力图使自己成为一个批判型的知识分子。如果考察一下他当时的作品，联想当时的社会环境，人们不难看出他那时就已经在反对文学常规，反对居支配地位的文学批评模式。可以说，詹姆逊的所有作品构成了他对文学批评中的霸权形式和思想统治模式的干预。

20世纪60年代，他受到新左派运动和反战运动的影响，集中研究马克思主义，出版了《马克思主义和形式》（1970），介绍新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辩证传统。自从在《语言的牢笼》里对结构主义进行阐述和批判以后，詹姆逊集中精力发展他自己的文学和文化理论，先后出版了《侵略的寓言：温德姆·路易斯，作为法西斯主义的现代主义者》（1979）、《政治无意识：作为社会象征行为的叙事》（1981）和《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1991），同时出版了两卷本的论文集《理论的意识形态》（第一卷副标题为“理论的境遇”，第二卷为“历史的句法”，两卷均于1988年出版）。随着文化研究的发展，他还出版了《可见的签名》（1991）和《地缘政治美学》（1992），收集了他研究电影和视觉文化的文章。此后他出版了《时间的种子》（1994）和《文化转向》（1998）两部论述后现代主义的著作。这期间，他仍然继续研究和阐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美学，出版了《后期马克思主义》（1990）、《布莱希特与方法》（2000）和《单一的现代性》（2003）。

在詹姆逊的作品里，除了《萨特：一种风格的始源》一书之

外，他一直坚持两分法或辩证法的解释方法。应该说，他的著作具有明显的连续性。人们不难发现，从 20 世纪 70 年代初到 80 年代后期，随便他的哪一篇文章或哪一本书，在风格、政治和关注的问题方面，都存在着某种明显的相似性。实际上，今天阅读他的《理论的意识形态》里的文章，仍然会觉得这些文章像昨天刚写的一样。然而，正如詹姆逊在论文集的前言里所说，在他的著作里，重点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从经转到了纬：从对文本的多维度和多层面的兴趣，转到了只是适当地可读（或可写）的叙事的多重交织状况；从解释的问题转到了编史问题；从谈论句子的努力转到（同样不可能的）谈论生产方式的努力。”换句话说，詹姆逊把焦点从强调文本的多维度，如它的意识形态、精神分析、形式、神话—象征的层面（这些需要复杂的、多种方式的阅读实践），转向强调如何把文本纳入历史序列，以及历史如何进入文本并促使文本的构成。但这种重点的转变同样也表明詹姆逊著作的连续性，因为从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到 90 年代，他一直优先考虑文本的历史维度和政治解读，从而使他的批评实践进入历史的竞技场，把批评话语从学院的象牙塔和语言的牢房里解放出来，转移到以历史为标志的那些领域的变化。

因此，人们认为詹姆逊的作品具有一种开放的总体性，是一种相对统一的理论构架，其中不同的文本构成他的整体的组成部分。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从精神分析到后现代主义，许多不同的观点都被他挪用到自己的理论当中，通过消化融合，形成他独创性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和文化理论。马克思主义一直是詹姆逊著作的主线。他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利用对意识形态和乌托邦的双重阐释，对文化文本中意识形态的构成因素进行分析和批判，并指出它们的乌托邦内涵，这使他不仅对现行社会进行批评，而且展现对一个更美好的世界的看法。可以说，在马克思

主义理论家厄斯特·布洛赫的影响下，詹姆逊发展了一种阐释的、乌托邦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观。

詹姆逊早期的三部主要著作及其大部分文章，旨在发展一种反主流的文学批评，也就是反对当时仍然居统治地位的形式主义和保守的新批评模式，以及英美学术界的既定机制。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黑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在欧洲和美国出现，《马克思主义和形式》可以说是对这一思想的介绍和阐释。但在这部著作中，詹姆逊还提供了其他一些马克思主义者的基本观点，如阿多诺、本雅明、马尔库塞、布洛赫、卢卡奇和萨特等，并从对他们的分析中形成了自己的观点和立场。他偏爱卢卡奇的文学理论，但坚持自己独特的黑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并把它在后来的作品里一直保持下来。

卢卡奇论现实主义和历史小说的著作，在詹姆逊观察文学和对文学定位方面都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但他一直不赞同卢卡奇对现代主义的批判。不过，他挪用了卢卡奇的一些关键的概念范畴，例如物化，并以此来说明当代资本主义的文化命运。在詹姆逊的著作里，黑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的标志包括把文化文本置于历史语境，广义的历史断代，以及对黑格尔的范畴的运用。他的辩证批评主要是综合不同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把它们融合成一种更全面的理论，例如在《语言的牢笼》里，他的理论融合了结构主义和符号学，以及俄国形式主义。在《政治无意识》里，他广泛汲取其他理论，如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拉康的心理学，德里达的解构主义，萨特的存在主义，等等，把它们用于具体的解读，在解读中把文本与其历史和文化语境相联系，分析文本的“政治无意识”，描述文本中意识形态和乌托邦的体现。

对詹姆逊来说，辩证的批评还包含这样的内容：在进行具体分析的同时，以反思或内省的方式分析范畴和方法。范畴连接历

史内容，因此应该根据它产生的历史环境来解读。在进行特定的、具体的研究时，辩证批评应该考虑对范畴和过程的反思；应该考虑相关的历史观照，使研究的客体在其历史环境中语境化；应该考虑乌托邦的想像，把当前的现实与可能的选择替代相对照，从而在文学、哲学和其他文化文本中发现乌托邦的希望；还应该考虑总体化的综合，提供一种系统的文化研究的框架和一种历史的理论，使辩证批评可以运作。所有这些方面都贯穿着詹姆逊的作品，而总体化的因素随着他的批评理论的发展更加突出。

20 世纪 70 年代，詹姆逊发表了一系列的理论探索文章和许多文化研究的作品。这一时期，人们会发现他的研究兴趣非常广泛，而且因其理论功底具有相当的洞察力。他的研究范围包括科幻小说、电影、绘画、魔幻叙事和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文学，也包括马克思主义文化政治、帝国主义、巴勒斯坦民族解放问题、马克思主义的教学方法，以及如何使左派充满活力。这些文章有许多收到《理论的意识形态》里，因此这部著作可以说是他在《政治无意识》里所形成的理论的实践。这些文章，以及《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里的文章，可以联系起来阅读，它们是他的多层次理论的不可分割的部分，表明了文学形式的历史、主体性的方式和资本主义不同阶段的相互联系。

应该说《政治无意识》是詹姆逊最重要的作品，在这部作品里，他的理论综合表现得最为系统。《政治无意识》包含着他对文学方法的阐述，对文学形式历史的系统创见，以及对主体性的形式的隐在历史的描述，跨越了整个文化和经验领域。詹姆逊大胆地建构他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他认为这是广阔的、最富包容性的理论框架，可以使他把各种不同的方法融入到他自己的方

法之中。他在从总体上考察了文学形式的发展历史之后，通过对意识形态和乌托邦的“双重阐释”（坚持乌托邦的同时对意识形态进行批判）的论述，确立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方法。受卢卡奇启发，詹姆逊利用历史叙事说明文化文本何以包含着一种“政治无意识”，或被埋藏的叙事和社会经验，以及如何以复杂的文学阐释来说明它们。在《政治无意识》里，詹姆逊谈到了资本主义初期资产阶级主体的构成，以及在当前资本主义社会里资产阶级主体的分裂。这种主体分裂的关键阶段，在他对吉辛、康拉德和温德姆·路易斯的作品的分析中得到了充分表现，并在他对后现代主义的描述里得到了进一步深化。

实际上，詹姆逊对后现代主义的研究是他的理论计划的合乎逻辑的后果。他最初对后现代文化特征的分析见于《后现代主义和消费社会》一文，而他的综合思考则集中于他的长文《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的理论，他对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新的“文化要素”进行了系统的解释。

在他的分析里，詹姆逊根据新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论的模式，把后现代文化置于社会阶段论的理论框架之内，指出后现代主义是资本主义新阶段的组成部分。他宣称，后现代主义的每一种理论，都隐含着一种历史的断代，以及“一种隐蔽或公开的对当前多国资本主义的立场”。依照厄尼斯特·曼德尔在其著作《晚期资本主义》中的断代方式，詹姆逊提出：“资本主义有三个基本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标志着对前一个阶段的辩证的发展。它们分别是市场资本主义阶段，垄断资本主义阶段或帝国主义阶段，以及当前这个时代的资本主义——通常人们错误地称作后工业资本主义，但最好称作多国资本的资本主义。”他认为，与这些社会形式相对应的是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等

文化形式。

在《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可见的签名》、《时间的种子》和《文化转向》里，詹姆逊进一步发展了他的主张，从而使他成为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家：他一方面保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同时对极不相同的文化文本所包含的政治、意识形态和乌托邦思想进行分析。他的著作把文学分析扩展到通俗文化、建筑、理论和其他文本，因此可以看作是从经典文学研究到文化研究这一运动的组成部分。

詹姆逊今年已经 70 周岁，但他仍然孜孜不倦，从理论上对资本主义及其文化和意识形态进行探索。在全球化的形势下，他关注世界经济的发展变化，关注全球化与政治、科技、文化和社会的关系，揭露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并力图从理论上阐述这些矛盾。在他看来，资本的全球化和高科技的发展可能会导致新的社会和文化革命，出现新的政治和文化形态，但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并不会过时，而是应该在新的条件下进行新的解释和运用。他仍然坚持乌托邦的想像，认为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可能会出现新的世界范围的“工人运动”，产生新的文化意识，而知识分子的任务就是要从理论上对这些新的情况进行描述和解释，提出相应的策略，否则谈论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就像空中楼阁，既不实用也没有基础。

不过，必须承认詹姆逊的著作确实难懂。他喜欢用长的复合句，从句套从句，常常使人觉得眼花缭乱。有人认为这是因为他刻意追求复杂的“理论节奏感”，追求德国式的逻辑严密性。也有人说这种风格是他的理论建构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因为他认为世界是一个复合的整体。还有人说这种风格虽然带来困难和困惑，但同时也带来快感和高雅感。詹姆逊的另一个困难是，他是个自成体系的思想家，因此，甚至局部和具体的分析，也总是

处于一种大的理论框架之中。具体分析虽然采用辩证的方式，但总是关联到一种复杂而具体的文化和社会理论。那种理论提供潜在的设想和参照，而不是明显地呈现出来。所有这些像是一个悖论：读詹姆逊总是读整个作品而不是单独一个文本。这也许是所有自成体系的思想的一个特征：开始阅读时非常困难，因为必须找出基本的前提；但一旦理解了这些前提，其论点便会说明越来越多的问题。

这里选译的四卷本《詹姆逊文集》的文章，是在詹姆逊授权之下并经过征求他的意见完成的，可以说基本上反映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他的思想和理论。四卷虽然标题不同，各有侧重，但它们之间并没有明确的分野，而是具有内在的联系，相互交叠，应该说四卷是一个整体。其中有些译文曾在其他地方发表，但一大半都是新译。由于由多个译者翻译，虽然我们尽量对译名和术语做了统一，但恐怕仍有疏漏之处，对此我们希望读者予以谅解并给予纠正。

人们常说，严格讲翻译是不可做的。就是说，在翻译过程中，必然会失去原来的某些东西，甚至会有“误解”——“误读”现象。哈罗德·布鲁姆认为，阅读总是“误读”，但有“肯定的误读”和“否定的误读”。我们主张“肯定的误读”：根据自己的知识结构，在理解和联想的基础上，说明（翻译）原作的意义。这样说，我并不是为“不忠实”的翻译开脱，而是希望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充分利用自己的知识构成，驰骋自己的想像，前后左右进行联想，以便从这些文集中获取更多的启示。至于翻译中的错误和不当之处，毫无疑问，我们恳切期望广大读者和方家批评指正。

本书在编辑出版过程中得到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有关同志的大力支持，在此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并对所有译者付出的辛

勤劳动表示真挚的谢意。

最后，我们把这四卷《文集》的中文版献给詹姆逊，作为对他 70 周岁的纪念，并对他的学术成就表示衷心的祝贺。

王逢振

2004-04-14（詹姆逊 70 周岁生日）

目 录

辩证的批评·····	(1)
马克思主义与乌托邦思想·····	(98)
关于布莱希特和卢卡奇之争的反思·····	(106)
马克思主义与理论的历史性·····	(127)
批评的历史维度·····	(165)
具象的相对主义或历史编撰诗学·····	(188)
道德对伦理实体, 或者阿拉斯代尔·麦金太尔的 亚里士多德式马克思主义·····	(206)
单子生产论·····	(212)
认知的测绘·····	(293)
后马克思主义五条论纲·····	(308)
德勒兹思想中的马克思主义与二元论·····	(317)
对本雅明的几点看法·····	(344)
访谈录: 詹姆逊—李泽厚—刘康·····	(349)
附录 1 詹姆逊的后现代马克思主义·····	(370)
附录 2 詹姆逊学术生涯概况·····	(390)

辩证的批评

这可能就是对辩证批评的现象学描述吧。然而，其矛盾却又不像初看起来所表现得那么巨大。辩证写作的独特困难实际上在于它的整体主义的、“总体化的”特征：仿佛不首先讲了所有的事物，就不能够讲述任何一个事物；也仿佛随着每个新观念的出现，势必需要概述整个的体系。因此，正是公允评估黑格尔极为随便说出的意见的尝试，才最终把一大团纷乱杂陈的黑格尔式形式序列同这种意见一起展示出来。因此，也正是为评述马克思而提出的某个论点，或者写出的其他著作或文章，才恪尽职责地最终成了对整个历史唯物论的评述。对于辩证的思维来说，不存在什么内容，而只存在总体内容；而且正是由于这个缘故，现象学（正如当代的其他伟大哲学体系，不是新内容的发现，而是形式上的革新）才似乎对否则于我们来说就是有组织的困境的那种事物提供了答案。因为现象学的确切意图不是说明一种思想是什么，而是说明感觉它像什么。它的宗旨不在于对（暂时放在括弧中的）内容作出陈述，而在于描述其一切时间性特征均和那内容相符的精神运作。对于读者来说，它的证明方式不在于逻辑论证，而在于是否对认识引起冲击。

我从几个不同的观点出发，论述过当代对辩证法所做的工作。这些“体系”或者部分体系——阿多诺论述时间的辩证演化；本雅明、马尔库塞和布洛赫论述辩证思维本质上是诠释的或非神秘化的同时又是复原的性质；卢卡奇论述艺术建构和社会生活自身基本现实之间的征兆性关系；萨特论述这些现实作为阶级

对抗的伪装和无法伪装的性质——最终都互相补充，它们表面上的不相一贯，都在某种更大的辩证综合里化解。但我们的任务不是对这种综合进行哲学的、有序的、系统的说明。然而，我们倘若始终记住下面篇幅当中那种描写性的、现象学的、有意为之的主观取向，那么，在这些局部研究的一侧，似乎还有召唤辩证文学批评的余地，并在超乎这种批评之外，还有召唤一般辩证思维的余地，它们是一种时间形式，一个过程，一种对独特而确定的结构的实际经验。

这种思维当然是思维的平方：是正常思维过程的强化，从而使一种更新了的光线照亮这些过程强化的客体（对象），仿佛在它的直接困惑中，心灵试图凭借意志力，凭借命令，抓住自己的鞋襪，使自身高扬起来。面对不进行深入思考的心灵的这些运作程序（无论心灵是在与哲学的或艺术的、政治的或科学的问题和客体进行搏斗），辩证思维并不是试图完成并完善这些程序的应用，以便拓展它自己的注意力，将这些程序也包罗于自己的意识之中：换言之，与其说它的目的在于解决所说的这种特殊困境，不如说在于将这些问题在更高层面上转换成它们自己的解决方法，并使问题自身的事实和存在变成新研究的出发点。这的确是辩证过程中最敏感的时刻。在这一时刻里，思维的整个复合体借一种内部杠杆作用被高擎起一层，而心灵现在也由于经过一种变速，发现自身愿意把原来是问题的东西当成答案，以将自身纳入问题的这样一种方式置身于它原先的努力之外，不仅把这一困境理解为客体的一种抵抗，而且也理解为以一种策略方式部署和配置来反对它的主体的结果——简而言之，就是理解为确定的主客体关系的功能。

由正常的客体取向的心灵活动到这种辩证自我意识的转移，具有一种屏息静气状态——有些像电梯下落或者客机突然俯冲时

我们感到恶心战栗的情景。正如这使我们想起我们作为思考者和观察者的精神状况一样，同样也使我们想起自己的肉体。这种震惊的确是基本的，并且构成了这样的辩证：没有这一转换时刻，没有这种最初对旧有的、更幼稚的立场的自觉超越，任何真正辩证地达到意识就都无法实现。

但是，恰恰由于辩证思维紧紧依赖于它应该超越的那种习惯性的日常思维方式，才可以采取几种不同的、明显矛盾的形式。因此，当常识主宰着我们正常的日常心智氛围并成为其特征时，辩证思维自身表现为反常的琐细、过分的精巧和过分的微妙，它提醒我们：简单，实际上只是一种简单化，所谓的不言自明，也是从大量隐蔽的预设中获得它的力量。另一方面，我们按照知识分子的方式，着手通过一系列的抽象推演开去，每一次抽象都渐次愈来愈远离真实本身，并在我们如此推演时弥漫着一种令人不安的疑惑，怀疑整个摇摇欲坠的结构不是新自然法则的界碑，而是某种私人心智癖好规则的界碑；这时，辩证思维便呈现为一种残忍的分裂，像快刀斩断了的乱麻，突然为我们复原了最粗粝的真理，恢复了像常识本身那样令人不快的平凡事实。辩证认识这两种表面对立的效果，实际上像我们以后将要看到的那样，大致与黑格尔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各自的辩证法相一致。

下面是对辩证思维的几个最典型特征的描述，特别是对这努力解决具体文学形式问题时的特征的描述。这种描述当然不可能完整，但却试图解决完整性的问题；而且从另一种意义上说，由于在愈益拓展的阐释网之内，每一个题目似乎都在不同语境中和在更高层面上概述前一题目，所以这种阐释网应该使我们愈来愈接近所有辩证思维中那个终极客体（对象），也就是具体事物自身。

I 黑格尔式文学批评：历时性建构

辩证法必须讲述的真相，无疑是辩证颠倒的真相，即将一种现象变为它对立面的那种悖谬转变，而数量转变为质量只是这一转变的比较著名的实例。它可以描述为时间中的蛙跳事件，在其中，给定的历史境况的弊端，实际上原来是它秘密的长处，看似内在优越性的东西，却突然证明是为自己未来的发展加上了坚不可破的限制。实际上，它是一个限制的颠倒问题，是一个由否定到肯定以及由肯定到否定的转换问题；而且从根本上说是一个历时性过程。

为了方便地给予客观的和外部的说明，我们可以回想一下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的技术发展状况，当时美国和苏联两国都是德国导弹发展研究的继承者。那时，不平衡情况自然是在原子能领域；而美国进行实验的目的，也正是为了缩小原子弹的体积，并增加其杀伤性能。几年之后苏联的第一批原子弹，相对来说仍然处于笨重不便的状况。因此，为了运载这些原始的庞大装置，苏联技术不得不发展能将巨大有效的负荷送入轨道的导弹，这些导弹后来用于运载第一批人造地球卫星升空。然而，美国的武器优势，因其发展导弹的目的是为了运载它们自己较小的原子弹头，结果变成了美国在导弹发展上的差距。在进一步的发展中，这种情况自然又再次颠倒过来：美国人正是由于他们的导弹没有这么大的威力，才发现自己为了发射升空而不得不发展更小更精密的晶体管化的仪器部件；而并不处于这种压力之下的苏联人的不太精密的机械，传送回来的信息相对来说数量却较小。如此等等。当然我们在这种情况下略去了一些因素，特别是空中力量因素，这又会使我们回到战略轰炸那段历史，进而回到一个陆上强国和

一个海上强国的对峙，以及最终回到两个超级大国之间作为一个整体的地理、历史和经济的~~不相一致~~，就是说，这一特定系列辩证颠倒的整个情景，最终将包含着对具体历史自身因素的一种沉思。

这种模式，正像前面一章对音乐所作的说明一样，虽然就其本身的方式而言可能是抽象的，虽然是简单化的而且失去了日常社会现实的复杂性，但却使我们能够就一般的辩证分析来证明某些基本的论点。首先，这种分析显然事先假定了一组数目有限的因素最初与历史总体或历史连续统一体的分离。在这里，这些因素就是导弹发展和原子能研究。不过，在文学领域里，这些关键因素或者我们将要称之为作品主要范畴的最初选择，明显是任何辩证批评的策略性时刻。

于是，这些范畴被视为容纳着彼此之间的关系，从而一方的改变也涉及另一方在比例上的相应变动；这自然是我们谈及现象的相互辩证关系时的最基本含义，换言之，谈到对这些关系的辩证理解时的最基本含义。也许不太经常为人所认识的，是对辩证关系的这样一种意识，如何包括或隐含着一种作为表达它们必要条件的历时性框架。

上面列举的例证具有平行序列结构上的独特性，它显然以每个阶段的逐点对比唤起了彼此的注意；因而美国的不平衡突出了苏联平衡力的性质，反过来也是如此。在大多数的辩证分析中，辩证作用的深刻对比性质，可以说只是以区别知觉的形式而隐蔽含蓄地发挥作用，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它允许我们通过同时意识到某物之所非，来发现某物之所是。因此，把一个现象辩证地表达为各力量或范畴的某种比率，同时包含着对这些范畴彼此之间作出在逻辑上可能的其他安排；而这些允许对研究对象的全部特性进行测定的其他形式，又是依照某种序列来安排的。这